

# 从“英国绅士”到“新西兰人”

## ——谈新西兰民族文学的成因

虞建华

有记载的新西兰历史不长,新西兰文学史则更短。1796年詹姆斯·科克重新发现新西兰后,这个岛屿才为世人所知,而真正较大规模的殖民是1840年英国吞并新西兰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我们暂不考虑毛利人的口头文学,新西兰的文学史从头至尾仅一百余年。但在这段不长的时间内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殖民地文学到民族文学的过渡。

民族文学的产生过程,实际上是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在新西兰,则是“新西兰人”的概念萌发、巩固及其在文学中反映和表达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巨变的巨变。对一个民族文学产生的研究,不仅对新西兰,而且对英语文学的第三支——新兴的英联邦文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虽然对新旧文学的转折人们不持异议,但分界时间却众说不一。我们认为,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以弗兰克·萨杰逊为首的新一代作家,在文学中为“新西兰人”重下了定义,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局面,把这个时间作为承前启后的过渡较合乎情理。

乔治·格雷爵士1854年写《新西兰人的神话与传说》时,“新西兰人”指的是毛利人。白人移民自然不愿屈尊俯就,与裸体的野蛮部落相提并论。他们自认是旅居他乡的欧洲人。由于百分之九十八的白人移民来自英伦三岛,不管在社会上还是文化上,主导当时新西兰的是英国传统。从上一世纪末起,该国人口剧增,但“家乡”观念依然强烈。新居民带来了英国的一切现成样板,而对当地白人后裔来说,殖民拓居也只不过是一两代人的事情。这些人仍然把自己看成是英国家庭的成员,就连1912年到1925年间任职的新西兰首相威廉·梅西,也视他的国家为“帝国遥远的牧场”。<sup>①</sup>英国的生活、情趣、信仰他们都记忆犹新,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行为、社会习俗,他们仍模仿沿用。

既然有记载的新西兰史从英国殖民开始,那么最初的新西兰文学无疑也是欧洲进口品,而不是本地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土文化和海外之间,或者说帝国主义殖民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但直到二十世纪初,舶来文化仍占据着压倒优势,表现民族思潮的民族文学毫无容身之地。

<sup>①</sup>引自H·Winston Rhodes, Frank Sargeson (《弗兰克·萨杰逊评传》), Twayne Publishers出版, 1969年第28页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新西兰的移民主要来自英国中产阶级的中下层。这些人在资本主义世界生存竞争中屡遭挫折，因此敢断然背弃母国，到新土地寻求兴发腾达的机缘。而另一方面，他们已经获得了高于劳动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唯恐在新环境中失于一旦，从而在思想上行为上又极其保守。由于这种双重性，他们企图依样画葫芦，按照自己熟悉的模式，在新环境中创建他们自己的“英国”，以实现旧大陆无法实现的夙愿。尤其是新居民的中上层，更是一成不变地固守英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唯恐有丝毫偏离，而对新土地迫切需要的改革则熟视无睹。他们不敢正视新西兰生活现实，不敢面对又一次失败的打击，因此退避三舍，寄居在对未来的瑰色憧憬之中。但是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不断深化，不容回避。民族归属的抉择，在新西兰这个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于是就包含了远为深广的寓意：承认“新西兰人”的身份，就意味着“英国梦”的破产；而反之，继续以“英国绅士”自居，视新西兰的严酷现实而不见，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固执。

文学领域中“英国绅士”和“新西兰人”在三十年代终于形成对峙，但在此之前的殖民时期文学，实际上只不过是英国文学在海外的延续。作者往往站在欧洲人的立足点，叙说他们在异乡陌土的经历和见闻。

新西兰的早期小说不外是写作者个人经历，从英国出发，到海外闯荡、定居，其中又牵强附会地加上离奇的情节。书是为英国读者写的，新西兰本土没有销售市场。为了迎合欧洲读者的口味，小说主题无法摆脱南渡太平洋、殖民拓居、毛利人的生活和战争及奥塔哥淘金热这四大类。文学评论家琼·史蒂文斯认为，“只是由于这些小说的地理背景，我们才称它们为新西兰小说。小说人物一概是英国式的，不可救药地风度翩翩，文雅潇洒。未开垦丛林地的便餐，他们端上香槟和火鸡；会客室书架上，他们摆设着蓝封皮的金斯莱，棕封皮的麦考莱，红封皮的萨克雷和狄更斯，而且还有装饰精致的全套《康希尔杂志》。”新西兰的诗歌也只有重弹“自然”、“美”、“宇宙大同”之类空洞的欧式老调，要不就是对丁尼生或朗费罗不高明的模仿。

在殖民早期，穷人要在艰苦环境中立足谋生，富人想从毛利人手中“买”到更多的土地，成为大土地拥有者，而中间阶层也千方百计寻找发小财的机会。这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对他们来说，文学艺术是与现实生活关联甚微的奢侈，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新西兰另一位史学家亚瑟·琴·汤姆森讲到，在当时，“挖土沟的要比诗人更受尊重。”<sup>①</sup>他的话很具体地反映了文学在当时生活中的地位。殖民地新西兰没有自己的强大文化与宗主国的进口文化相抗衡，因此英国式的主题、英国式的语言和装腔作势的英国绅士便在文学中剥夺了当地居民的发言权。

新世纪到达后，殖民拓居相对稳定，新西兰开始有了自己的读者对象，一个说教文学便应运而生。文学宣传上层阶级的传统道德和宗教准则，麻痹人民的思想，让他们安分守己地做一个远居他乡的帝国侨民。直到那时，英国文化仍然左右着新西兰，“文学自立”只是少数人的空谈。

到了三十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新西兰文学中出现了萨杰逊、约翰·马尔根、艾·李和罗宾·海德等一批杰出的小说家。这支新军所向披靡，打破了殖民地文化的坚冰，使新西兰文坛出现了转机。这些青年作家不做“英国梦”，眼睛向下，观察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探讨新西兰人面临的问题。他们组成了第一代民族文学作家，把自己与土地视为一体，从本民族的立场上看待一切。从此，文学重心移到了现实主义，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白人在这

<sup>①</sup>W·HO·liver, *The Story of New Zealand* (《新西兰史话》), Faber and Faber出版, 伦敦, 1960年第158页

块新拓居地上的生活。

诗人艾伦·柯诺在《关于新西兰文学的定义问题》一文中提出，名符其实的新西兰文学作品，至少要符合三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要有点价值；第二，作者是我们中间的一员；第三，不管多么间接，对我们自己要有所认识。<sup>①</sup>他指的显然是殖民地文学以后的民族文学。第一点实际上是后两点的归纳和体现，而后两点都围绕着“新西兰人”这个中心概念：从新西兰的眼光出发，认识新西兰人的问题。第一代民族文学作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开始了他们的文学新里程，他们的作品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无可争辩地属于新西兰这个新民族的。

但是我们应该说，不是这些作家的天才扭转了一个国家的文学方向，而是社会内部运动造就了这一批优秀作家。文学的转向反映了社会和人的巨变，而敏锐的作家则善于捕捉、提炼、综合、表达这种或是突发的或是潜移默化的变更，用文笔响出时代的声音。我们回顾一下，三十年代前接踵而来的大事件如何滋养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促使生活中的新西兰人在文学中描绘自己不太高大的形象。

## 二

进入新世纪以后，新西兰社会几经波折。在动荡不定的气候中，民族文学的幼芽在新西兰大地破土而出，一些作家诗人挣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勇敢地探索表现代表真实生活中新西兰人思想行为的文学新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运动和经济大萧条冲击下，根深蒂固的英帝国殖民文化统治开始动摇，逐渐被新兴的地方文化取而代之。

###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争权夺利、瓜分势力范围的械斗，用史学家辛克莱尔的话来说，新西兰卷入大战只是出于“孝子之心”。但为了给宗主国尽孝道，新西兰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五万八千新西兰士兵在外国战场伤亡，在一个人口仅百万的小国，这就是说，每十七个新西兰人中就有一个或者战死疆场，或者被抬着回来。死亡总数高于比利时，而比利时不仅人口超过新西兰六倍，而且还是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

全国适龄男子几乎近半数当了兵，要在军队中供养他们，新西兰不得不在经济重压之下苦撑苦度；惨重的伤亡又使新西兰人在思想上大受震惊。一些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挪到了“新西兰人”的一边，重新评价这场灾难，批评英帝国迫使新西兰卷入战争的不公正做法，指责政府充当他人走卒，也抨击了新西兰人“爱国主义”的蠢行。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新西兰人该不该还把自己看成大英帝国的一员？该不该由自己来定夺取舍？为什么非得附炎趋势而不自立自强？为英国作出的牺牲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不幸，英国传统的统治地位开始面临挑战，对母国的信仰也产生了危机。1935年新西兰工党毫无基础地拍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口号，居然在大选中获胜。这至少说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新西兰人已不愿再尾随英国亦步亦趋，普遍希望社会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种催化剂，促使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甚至感情上产生分化。于是，新西兰人自己的形象就开始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小说中露面了。

### 民族主义运动。

<sup>①</sup> Allen Curnow, "New Zealand Literature: The Case for a Working Definition," 收编在 *Essays on New Zealand Literature* (《新西兰文学论丛》) Wystan Curnow 编,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出版, 奥克兰, 1973 年收编在第 141 页。

上一世纪最后几年中，新西兰担心受到开发较早，国力较强的澳大利亚吞并，决定拒绝加入澳大利亚联邦。许多新西兰人顿时意识到自己是同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欧洲人不同的一个整体，希望与澳大利亚保持相对独立。这种整体感也许是最初的民族意识。偶尔也有人发表新西兰应该有自己的文学艺术的议论，但当时的新西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极端依附英国，不可能在文学上独树一帜。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意识迅速增长，逐渐汇成了一股民族主义运动的潮流，激发了民族文学迅速走向成熟。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文化在三十年代突飞猛进，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首先，二十世纪开始后，人口剧增，民族自立的愿望也随着人口的上升水涨船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地出生的人口终于在数量上压倒了来自国外的前辈，这批人到了三十年代都已成年。他们深知自己是新西兰人，不想拉起英国的大旗；他们比较现实地看待国内的一切，不想把未来寄托在幻想之中，对前辈的创业理想持怀疑态度。这一代人不象他们父辈那样拘泥于英国传统，多少有点反叛精神，希望从既定的维多利亚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中解脱出来，因此，表达这一代人的要求愿望，塑造这一代人的典型便成了新西兰文学的新课题。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在新西兰有所发展，城市化也伴随而来。工业发展造成了阶级分化，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人得到的却只是贫困和生活无保障，城市贫民直接受到失业的威胁，受到商业化城市环境的压迫，因此也更容易转化为旧社会秩序的反叛者。第一批民族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与城市环境相悖的青年人。把城市工业化的直接受害者塑造成民族文学中最初的“新西兰人”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再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每况愈下，大走下坡路，而先前英殖民地各国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在国际上形成一股激流，最终迫使英帝国承认所有自治领为自治的英联邦国，（至少在理论上）与不列颠平起平坐。作为这个潮流的组成部分，新西兰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发展。由于民族主权和民族文学之间众所周知的关联，民族自主运动又推动了表达民族思潮的文学革命步伐。这场文学革命以“英国绅士”及其创造乐园的梦想向“新西兰”及其面对的现实这一转化为标志。

经济大萧条。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不仅使新西兰面临崩溃，而且构成了对殖民政治和文化最直接、最强烈的冲击。其后几年，新西兰深陷泥潭，自拔不得。经济大萧条给人民带来了双重打击，一方面是经济崩垮，另一方面是幻想破灭。由于新西兰经济过分依赖出口畜牧产品，对海外经济起落十分敏感，无力将经济危机这头来自欧洲的猛兽拒之门外。正如文学批评家怀斯坦，柯诺所说，“经济危机是我们无法拒绝的进口品，”<sup>①</sup>——因为它是世界资本主义机器的产品，新西兰工业势单力薄，只有听其摆布的命运，而无招架抵挡的力量。

大萧条使许多新西兰人看清，他们的殖民理想只不过是南柯一梦。这种认识是从记录、猎奇、说教文学跳跃到反映社会的现实主义文学必不可少的精神准备。政府的镇压则从另一方面改变了许多作家的态度，迫使他们对社会、对自己进行重新评价，从灰暗的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寻找受挫失意，迷惘挣扎的新西兰人的缩影。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经济大萧条促成了文学中的新基调，为“新西兰人”在文学领地登基铺设了台阶。

<sup>①</sup>Wystan Curnow "High in a Small Province" (《小地方的高等文化》) 收编在 *Essays on Zealand Literature* ; 第169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经济大萧条三大事件造就了第一批民族文学作家。这些人在社会颠簸中渡过了青少年时期，目睹了老一辈安乐梦的破产，对现实生活不抱幻想。他们的作品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阴暗面，对社会抱着批判态度，组成了资产阶级作家中的左翼，他们也曾有过自己的追求，也曾品尝了失败的痛苦。文学中的新西兰人往往保留着他们自己的身形容貌。

这一代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萨杰逊。我们不妨浅析他和他的一篇小说，以点见面，看一看当时的作者是如何认识自己“新西兰人”的地位，如何在文学中表现普通新西兰人的追求与失败的，他们的小说又是如何反映了殖民地文学到民族文学转折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文学人物和文学主题的变化。

萨杰逊出生于一个正统的“英国”式的家庭，父母不允许任何偏离英国中产阶级生活道德准则的越轨行为，但社会、生活对他的教育却在另一方面起着抵消作用。他认识到父母“信仰的是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因而成了家庭和社会的叛子。“我认识到我们的社会环境在我父母前辈眼里是理所当然，不可变更不容怀疑的客观现实，但对我，却根本不意味着非得如此。”<sup>①</sup>他彷徨苦闷，参加后又离开了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最后在1927年放弃工作，决心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殖民地环境，希望在欧洲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但欧洲的现实是与新西兰人头脑中的“样板世界”截然不同的东西。他在那儿看到了人类的悲剧，发现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次年，他急急返回了新西兰，终于确信自己是个无可非议的新西兰人，应该面对新西兰的生活，别无抉择：“我毕竟是个新西兰人，应该在这个国家立足生存，因为我无论如何命定属于这块土地。”<sup>②</sup>这个认识把他推上了文学道路，也决定了他以自己为原型，在小说中塑造真正的新西兰人。他决心用文学揭开社会的面纱，让更多同胞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地位，客观上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性质。而迎接他海外归来的经济大萧条，又为他的文学典型提供了时代背景，

萨杰逊早期作品篇幅众多，无论分析哪一篇都不能代表他的全部，更不能代表第一代民族文学作家的全部，但我们还是想管中窥豹，以期见其一斑。

短篇小说《一个好心人》(1641)取材于作者亲身经历的事情。他在他叔父农场帮工时，正逢大萧条。他的叔父连年剪下羊毛堆在仓库，宁可眼看着油脂下沉，毁坏成包的羊毛，也拒不廉价售出，因为羊毛价格是“对他劳动的侮辱。”萨杰逊知道，只有几乎绝望的人才咬咬牙切齿地做出这般不合常理的事情，默默地发泄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小说对此事件进行了加工：威廉斯是个种西红柿的，大萧条中一落千丈的售价刺痛了他的心，他一言不发，天天挥汗苦干，把收下的西红柿整齐地垛成一堆，拒不卖出。除了羊毛换成西红柿，置人于紧迫的困境中之外，这两个事件表面似乎类同，但小说中的新西兰人比生活中的新西兰人更加典型，更加包含了深刻的社会寓意。小说至少在几个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成功的人物典型塑造，深刻的社会主题和内在有机的象征手法。

人物塑造。记叙者“我”是威廉斯新雇的唯一帮工，因为中学毕业一直找不到工作，父

① Frank Sargeson, *Once is Enough* (自传《只此一回》), A. H. and A. W. Reed 出版, 惠灵顿, 1973年, 第101—102页。

② Frank Sargeson *Never Enough* (自传《永远不够》), A. H. and A. W. Reed 出版, 惠灵顿, 1976年, 第48页。

亲无奈才答应他给一个他们看不起的“怪人”做帮工，“我”在穷雇主那儿学到了学校和家庭环境中未曾学到的新道理，回家后“我用他说的话来反驳父亲，常惹得他发火。有些人一听到同报纸上不一样的话就坐立不安，我父亲恐怕就是这号人。”<sup>①</sup>

小说中的三个人是极有代表性的。威廉斯在思想观点上以他自己的准则独树一帜，在生活上，他不甘当工资奴隶，辞职种菜，自立谋生。他的言行与“正统”不同，代表了讲叙者向往的一种生活。父亲虽不过分富足，但却有着中上层阶级的一切特性，是一个来自旧大陆落后时代的“英国绅士”，他保守偏狭，对新思想感到恐惧。而站在威廉斯和父亲代表的两个世界中间的，则是萨杰逊各篇小说中经常出没的“新西兰人”这个文学原型，他贪婪地汲取那些“截然不同但又不很理解”的新内容，与父亲的对立已开始公开化了。在殖民地后期新西兰这个典型环境中，这些人物都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主题思想。小说的主题思想是资本主义经济给新西兰人带来的幻想破灭。威廉斯虽不想发财致富，但确实渴望以自己诚实的劳动，换一个平平安安的小家庭生活：“男人在园里干活，老婆在家中料理，孩子在摇篮安睡。”

他断绝一切闲娱娱乐，夙兴夜寐，积足钱后在本城买下一块小园地种植西红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实现这个小小的奢望，他首先得放弃结婚，把钱存起来。当西红柿长势喜人，成了他希望所在时，他又遭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头棒喝。大萧条中罐头厂倒闭，西红柿价格“还不够采摘的工钱”。他斗败了，坐在成堆的西红柿前伤心地笑着。理想追求几乎摧残了他的身体，理想破灭又压垮了他的精神。年轻的“我”目睹了这个人的悲剧，目送着威廉斯被人抬出菜园。这是许多新西兰人在这块土地上以奋斗开始，以惨败告终的集中写照。

象征手法。小说由于那堆西红柿的象征而更加完善。“那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堆，他把西红柿堆成了一个金字塔。”这里包含了多层象征含义。首先，这是一个劳动者的英雄丰碑。威廉斯舍弃一切，用心血灌溉了这堆丰硕的果实，这上面闪烁着他勤劳和智慧的光泽。但是人类劳动成果又被资本主义机器糟蹋。这堆西红柿因此也象征着创造性和摧毁势力两者间荒唐婚姻所生的外胎。从另一层意义上看，这堆西红柿外层光亮鲜艳，但“里面已彻底腐烂”。这又是殖民地加资本主义的新西兰社会上层建筑的象征。小说的真正主人公是一直在一旁观察思索，与威廉斯同喜同悲的青年帮工（这也是作者本人的影子）。对他来说，这是他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他在这个事件中体验了人民的痛苦，看到了这个“福利社会”幕后的演出，对自己的社会有所觉醒。

马尔根、海德、艾·李等其它同代作家，也同样以同情的笔调写低层社会的新西兰人，又以批判的态度反映他们不得不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海德的两部小说《地狱通行证》（1936）和《岁月宽容》（1938），都围绕斯塔克这个中心人物展开。他十六岁参军为英帝国打仗，四年后，这位出生入死的英雄，幸存回到了新西兰，但却被社会遗弃，在大萧条中苦苦挣扎。马尔根成名小说《孤独者》（1936）中的主人公约翰逊，也是颇有影响的文学典型。他反叛社会传统，又被社会孤立，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找到精神寄托，甚至无法找到插足之地。艾·李的早期作品虽然尚不成熟，但也以他“政治小说”中的激进观点冲击了旧文坛。

不难看出，这些小说与先前的作品已不能一并而论了。突破的方面显著地表现在：一，

<sup>①</sup> Franr Sargeson, "A Man of Good Will", 收编在 *Short Story by New Zealanders* (《新西兰作家短篇小说集》), Phoebe C. Meikle 编, Longman Paul 出版, 1970年, 第13页, 后几段引文出处同。

文学主题转向了现实生活，转向了低层社会；二，文学中排斥了乐观基调，社会图景的底色是灰暗的；三，塑造了令人信服而又典型的新西兰人。

这些作家的小说人物往往不谋而合，在家庭背景、认识态度和社会境遇等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同作者本人一样，是在社会动荡中成长的青年。他们敏感地发现社会形态的满目疮痍，但没有医治良方，只能弃而远之，在精神的沙漠地带彷徨徘徊。我们可以把小说中的这些青年人综合一体，视其为文学中第一个“新西兰人”的形象——一个被新滋长的资本主义势力踩在脚下的小人物。因此，“新西兰人”是个旧社会的弃儿，但不是新时代的骄子。他是个贫困、失意、无辜的青年，站在富有、得势和伪善的社会上层的对立面，他是个有血有肉的南太平洋岛上人，与维多利亚式小说人物没有亲缘关系。毋庸讳言，萨克逊等毕竟是资产阶级作家，他们笔下的“新西兰人”是以消极的态度出现的。他否定周围世界，但没有任何积极的信仰。他摆脱社会环境的反抗，最后只是逃到边远山区，远离资本主义文明。尽管这个文学雏形有他的局限性，但他与社会的对立和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恩格斯谈到文学现实主义时是这样下定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sup>①</sup> 我们无法证实这批作家对现实主义有否相似的理解，但他们的小说对这两条标准是吻合的。他们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新西兰的生活，加以解剖分析，而且在新西兰这个典型的社会、自然环境中，塑造了合适可信的典型性格，通过他们的视野，向读者展示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生活的困境，暴露了作者那一代新西兰人曾经面临、今天的新西兰人仍然面临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如物质崇拜，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经济剥削和贫富不均，以及精神危机等。

大萧条前后的新西兰社会经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政治上，要求独立的民族意识正在取代帝国主义的控制；经济上，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给许多新西兰人带来了不幸；文化上，这个国家正开始从英国传统中解脱出来，探索民族文学的新领域。变革的时代，需要在文学中有它的代表人物。“新西兰人”在文学中的出现，宣告了欧洲人写新西兰人的文学和新西兰人写给欧洲人看的文学的结束。描写对象和读者对象都转向本国，新西兰文学从此再也不是英国文学的附庸，而是拔地而起的一棵新苗。战争动乱、社会动乱和经济动乱迫使殖民地文学急急退场，与此同时，迅速成熟的民族意识促成了一个新民族文学登台亮相。如果说殖民时期文学是以浪漫主义的“英国梦”为精神支柱的话，那么，大萧条给新西兰人带来的幻灭，则把文学推进了现实主义的民族文学轨道，完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

<sup>①</sup>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信（1888年4月于伦敦），《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46页。